

例，魏晉學風極有相似之處。畢竟魏晉玄學，終於為唐宋開啟了另一境界的中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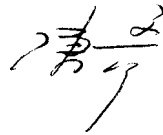
盱視今日的文化批判，其動能的來源相當複雜，不易釐清。若尋找一個較為明顯的現象，則最受衝擊的焦點，當是十八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思維：亦即標榜科學與理性的思考方式。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這一西方文化的思想主流，承受科技發展的驅迫及多元文化的檢驗，對於過去習以為常的一些觀念，我們的確必須有所省思。甚至一些視為當然的價值（例如生命、快樂……）都不得不賦予另一層內涵。

《二十一世紀》是中文的知識論壇，兩岸三地不少知識份子借《二十一世紀》的園地提出不少有意義的討論。《二十一世紀》的文章，課題多姿多采，也時時有觸及上述省思的論著。尤於中國文化的立場，常有所討論。我們預見這種討論會更多也更深入，也將更超越中國文化的範圍，關注人類社會的普世問題。

謹在《二十一世紀》十周年的專號，預祝下面十年，這一知識性的刊物，既能保持現有水平，而且繼長增高，成為中文知識界的重鎮。

許倬雲 杜克大學西孟講座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特聘講座

## 學術與思想並重， 超越與參與兼顧



90年代的中國不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精神昂奮時代，但卻是一個尤其需要精神與思想的時代。十年來，《二十一世紀》參與思潮激盪，洞悉時代先機，為90年代的中國思想留下了一尊亮麗的豐碑。我之珍視《二十一世紀》是因為它能夠堅持學術與思想並重，超越與參與兼顧。超越是指其思想與學術的多元，參與則指其針砭時弊、社會批判與立德建言。



十年來，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尤其是中國大陸與港台三地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二十一世紀》也已經名副其實地進入了二十一世紀。

作為本刊一名忠實的讀者和作者，感觸良多。

在本刊創刊號上，陳方正先生曾表示，《二十一世紀》應該為中國思潮的醞釀和發展起些微作用，希望它成為「茶館」而不是教室。十年後再來回顧《二十一世紀》的業績，應該說這個「醞釀思潮的茶館」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90年代的中國不是一個轟轟烈烈的精神昂奮時代，但卻是一個尤其需要精神與思想的時代。《二十一世紀》創刊於1990年，那是一個令人絕望的年代。其時，大陸充斥着憤懣與悲怨，沉迷和頹唐。剛剛過去的一場災難，不僅捲走了80年代的希望與幻象，而且更為可怕的是它意味着文化的潰敗與思想的退潮。正是此時，《二十一世紀》登場了！它頂着時代的迷茫，舉起文化重建的旗幟走上了90年代中國的人文舞台。《二十一世紀》的創刊向世界和國人宣示中國文化薪火不滅，80年代啟蒙精神仍在。同時，《二十一世紀》的創刊也意味着經歷劫難的中國文化人開始踏上走出幻滅的新路。三年之後，大陸《東方》、《中國社會科學季刊》、《現代與傳統》、《戰略與管理》陸續問世，知識界全面復蘇。可惜如今前三者已不復存在，這是中國文化的悲哀，也更說明《二十一世紀》的不可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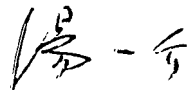
我看《二十一世紀》，總不能擺脫80年代「走向未來」的記憶，儘管二者從風格、學術取向到思想內容都有顯著的不同。80年代的「走向未來」同90年代的《二十一世紀》的相通是其文化信念和啟蒙精神。無疑，從社會呼應的角度來說，《二十一世紀》似乎沒有「走向未來」的風風火火，缺乏中國知識份子剛剛擺脫十年劫難時那種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氣概與雄風。然而，80年代風光雖好，但那卻是虛幻的一閃亮，飄渺天邊的海市蜃樓。90年代，尤其是90年代的初期是令人痛恨和使人麻木的時代，因為那是犬儒、卑鄙、欲望橫行的時代。然而，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才尤其需要呼喊和堅守，而只有在此時的呼喊和堅守才顯示出力量與眼光。《二十一世紀》沒有80年代的浮躁，但多了一份堅實。擺脫了虛幻，獲得了獨立。立足於香港的天時、地利、人和，《二十一世紀》經過十年的創業，已經儼然成為中國思想領域的一面旗幟，中西文化溝通對話的一座橋梁，大陸、香港、台灣及海外文化中國共建共守的文化家園。

十年來，《二十一世紀》參與思潮激盪，洞悉時代先機：激進與保守，後學與國學，民族主義與文化衝突，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制度創新與文化守成，保守主義與憲政設計，尤其是對大陸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的歷史反思，《二十一世紀》或開風氣之先，或推其深入，或引他山之石，為90年代的中國思想留下了一尊亮麗的豐碑。

我之珍視《二十一世紀》是因為它能夠堅持學術與思想並重，超越與參與兼顧。超越是指其思想與學術的多元，參與則指其針砭時弊、社會批判與立德建言。筆者久居法國，在寫下以上文字時，腦中自不缺乏法蘭西知識界這一參照系。參與(engagement)是法國思想刊物的傳統，《精神》(Esprit)、《現代》(Les temps modernes)都是參與的典型。70年代末以來，西方思想界也面臨潮流回蕩，後起的優秀法國人文期刊如《評論》(Commentaire)、《辯論》(Le débat)，一右一左，均是超越與參與並重，這既是時代的進步，也是治學的要求。希望十年之後的《二十一世紀》更為超越也更多參與。

陳 彥 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現職法國國際電台。

## 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



回顧幾十年來，看看我們走過的歷史，眾多的失誤，難道不都是由於聽不進不同意見而造成的嗎？對領導者多一點批評好，還是多一點「歌功頌德」好？領導者多聽一點批評意見好，還是只喜歡別人吹捧好？我想，還是多聽聽批評意見好。今天我們的社會「歌德派」太多了，而像子思這樣的人太少了。甚麼時候多一點子思，而少一點「歌德派」呢？

偶讀湖北荊門出土的郭店竹簡，其中有這樣一條：「魯穆公問於子思曰：『何如而可謂忠臣？』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公不悅，揖而退之。成孫弋見，公問：『向者吾問忠臣於子思，子思曰：恆稱其君之惡者，可謂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孫弋曰：『噫，善哉言乎！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嘗有之矣；恆稱其君之惡者，未之有也。夫為其君之故殺其身者，效祿爵者也。恆稱其君之惡者，遠祿爵者也。為義而遠祿爵，非子思，吾惡聞之矣。』」這是兩千三百多年前的一條竹簡，讀它，我深感經過了兩千三百多年我國的領導者在對待批評上並沒有甚麼進步，似乎反而大大不如魯穆公了。就當前的教育來說，誰不知道我們的教育存在着許許多多的問題，我們的